

# 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机理与途径

## ——基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视角

张小蒂 贾钰哲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第一作者近影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若要在国际分工中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必须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动态比较优势。企业家作为一揽子要素配置的支配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中国社会经济开放与发展中关键的主动性资源,因此,亟需高度关注企业家这一稀缺资源。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动力源,是企业家资源拓展与才能的提升,对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尤其如此。研究表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关键途径是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以此可构成企业家资源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互动纽带,并揭示“互动”的关联机理及实现途径,由此可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增强其现实解释力,从而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企业家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 市场规模 互动机理 实现途径

[作者简介]张小蒂(1951—),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贾钰哲(1985—),男,河南省开封市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5-0077-09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市场竞争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日趋严峻。中国若要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必须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动态比较优势,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大多具有静态特征。李嘉图在比较成本理论中虽然承认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但在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引入了一系列静态假定。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假设了各国的生产函数没有差异,这表明其比较利益形成的前提依然具有静态特征。若中国依照这些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则可能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新古典范式的主流比较优势理

论则认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sup>①</sup>,这一“升级”从本质上看,是由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即相对要素丰裕度的变化而决定的。林毅夫、孙希方提出,若要增进动态比较优势,首先应该遵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样资本反而会得到更快的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也会较快。<sup>②</sup>如此,企业自然会依据市场竞争需要在相对价格变化的基础上来调整

①② 林毅夫、孙希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6)。

自身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但这一比较优势若要在现实中转化为比较利益、实现产业的自动升级,其前提条件是具备完善的市场机制。显然,只有在成熟的市场中,比较优势“静态”向“动态”的自动切换才可能实现。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时期,这类转换无论在宏观层次还是微观层次都会面临较严重的信息障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这一概念(Krugman, 1987;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林毅夫, 2003),但他们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定义。在市场不完善的背景下,现有的相关理论仍难以回答以下问题:在要素比价扭曲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如何转型升级?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主体是谁?其动力源何在?如何针对转型大国推动动态比较优势增进?要回答上述问题,不能回避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信息障碍,而化解这一障碍的主要出路在于企业家资源的拓展。因为企业家才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处理市场信息的效率较高。企业家作为一揽子要素配置优化的主体,是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稀缺要素。因此,中国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重要的动力源是企业家才能的激活与显化,这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显得尤其突出。事实上,理论上的动态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中的比较利益必须经历真实世界的传导机制。这一转化的核心主体是企业家。这实际上可回答在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由谁推动、怎样推动的重要问题。至于转化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如何,则根本上取决于市场化导向的制度改革对中国企业家资源的激活、甄别、显化与拓展。可见,企业家资源这一特殊稀缺要素的拓展,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通过动态比较优势增进获取更多比较利益的捷径。因此,探索与揭示企业家资源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互动机理及实现途径,对中国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取得更多的比较利益来说,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分析

### (一)主要集中在对企业家资源内涵的探索

上

熊彼特(J. A. Schumpeter, 1997)高度评价了企业家在各种要素配置中的关键作用。新奥地利学派学者哈耶克(F. A. Hayek)、柯兹纳(I. M. Kirzner)等把市场看作是分散知识和信息的发现过程。钱德勒(1987)通过对美国大企业成长历程的分析,强调了企业家才能在捕捉市场商机方面的重要性。柯和马奥尼(Kor, Y. Y. & Mahoney, J. T., 2005)认为,企业家对要素的配置状况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张小蒂等(2008)发现了企业家与专业技术人员各自拥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前者的特征之一是拥有一揽子而不是单项要素的支配权。这些研究大多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但缺乏对企业家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因和内在机理的揭示,对中国转型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资源的特殊性及其拓展、显化机制研究较少。虽然熊彼特探索了企业家创新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但并未对企业家资源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关联机理与实现途径予以揭示。总体上看,现有对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难以突破传统相关研究中采用教育水平估计该类资本的路径依赖,难以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征作针对性的研究,以致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内在化在动因、主体与实现途径上均亟待明晰。

### (二)主要集中在以专业化分工深化体现的动态比较优势之研究上

亚当·斯密最早揭示了比较优势的内在性可体现为专业化分工的深化。杨格(A. Young, 1928)<sup>①</sup>首次提出劳动分工的深化与市场规模的互动可导致要素报酬的递增。他认为市场规模“不是单纯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sup>②</sup>。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 1977)认为,如果没有李嘉图意义上的外生比较优势,在两国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因规模经济的存在而内生出后天的比较优势。在这个

① Allyn A. Young,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38, No. 152 (Dec., 1928), pp. 527—542.

② 杨格在1928年论文中使用“market extent”或“market size”意指市场规模或市场容量。

意义上,斯密的分工深化理论更具动态特征。针对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之间存在的两难冲突,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作了进一步研究,其结论是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不仅有利于“两难冲突”的折中,而且可体现比较优势的增进。杨小凯(2003)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个人专业化视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其理论将交易费用纳入贸易理论的研究之中,构建了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说明了分工经济可建立在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此类模型之上。虽然杨小凯等人的上述研究高度关注了制度、交易效率等变量,但依然难以回答下列问题: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主体是谁?如果是企业家,其才能的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机理与实现途径又是什么?现有文献表明,杨小凯等的上述研究未将关键变量——市场规模作为联结企业家才能发挥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重要纽带。

(三)主要集中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动态比较优势关系的研究上

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克鲁格曼(Krugman,1987)首先将动态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同时内生,认为部门特定的累积生产经验决定着比较优势,而生产经验的积累是通过“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实现的,产业中过去积累的产量决定着当前的生产率。卢卡斯(Lucas,1988)认为,各国从事各自擅长的生产从而通过“干中学”效应积累技术、不断强化初始的比较优势。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构建了三部门增长模型,他们认为,知识溢出存在于国际范围、技术内生,那么长期贸易模式将依赖于相对要素比例。相反,有些模型的动态规模经济来自“干中学”,规模经济专属于某个国家,在动态规模经济条件下,长期贸易模式完全为初始比较优势所决定,存在锁定效应,即所谓“一朝落后,总是落后”(once behind, always behind)。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2003)分析了水平差异产品创新时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将产业内贸易放在动态框架下分析,尤其是引入了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的研发部门,并指出,当技术上具有初始劣势的国家在市场规模上远大于其贸易伙伴时,该国就有了扭转初始劣势的可能。里丁(Redding,1999)将“干中学”效应与

动态比较优势结合起来理解。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2003)从动态角度强调比较优势的演进最终要归因于一国R&D的投资数量。

## 二、企业家资源拓展与比较优势 增进的互动机理

### (一)企业家资源的显化

在各类人力资源中,企业家资源具有异质性特点。企业家的要素配置优化在预期收益上可大于由从事单一要素经营活动所获收益的加总之和。毋庸置疑,与任何其他资源相比,企业家是微观层次生产经营活动中一揽子要素配置的主体和核心资源。

应该指出,对企业家的理解应突破“自然人”的概念,企业家的才能主要体现在对市场信息发现与利用的较高效率及驾驭市场风险、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企业家才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成长经历正是企业家资源激活与显化的过程。因此,企业家资源的拓展与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即由后者表征的分工深化与比较优势动态演进)在互动方向上完全一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多处于“隐性”状态,而对于企业家资源也由于其上述特性难以定量分析而为大多数相关学术研究(通常研究的资源类型为“显性”)所忽视。企业家这类特殊资源必须经过市场检验,在“事后”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以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是企业家要素显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制度创新既是企业家资源显化的前提,又可构成一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重要变量。

中国企业家资源的显化与拓展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化体制改革导致的企业家资源激活与初步甄别;其二,市场化进程深化所导致的企业家资源的筛选与渐进成长;其三,由制度安排所引致企业家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能力持续提升,外部环境持续改善,潜能充分发挥。从企业家资源激活视角来看,企业家经营努力后所获取的绩效回报及其保障是其才能培育的主要动力源,也是企业家持续不懈经营努力的重要驱动力。正

如萨伊指出的：“安稳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sup>①</sup>在转型中的中国，市场化主导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产权界定日益清晰、合理。因此，体制改革是中国企业家资源内生拓展的根本动力源。

## （二）企业家资源的拓展

从企业家资源的成长视角来看，在转型经济中，政府通过体制改革至少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企业家资源的拓展发挥积极作用：（1）根据信息的半公共产品的性质，在搜集处理关于符合本国、本地区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的产业和技术、新产品的市场潜力等信息方面，对企业提供支持；（2）通过财政支持补偿企业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面临的外部性，增加外部经济，提升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收益率；（3）尽可能降低与消除有关行业的进入壁垒，提升企业家“干中学”的效率。

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家资源在显化方面的障碍除了其自身因素以外，主要受外部体制环境条件的约束，尤其表现在大量“有形”与“无形”的行业进入壁垒上。这导致了中国企业家资源主要集中在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行业，形成了基于“干中学”企业家资源拓展的瓶颈约束。目前，在中国的许多高端服务业与制造业中（如电信、金融、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等），均存在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进入壁垒，导致大量民营企业局限在低技术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其实中国并不缺企业家，缺的是让企业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制度和环境。因此，政府通过体制改革化解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各种进入壁垒，是企业家资源拓展、市场垄断程度降低、市场规模有效扩大、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国有企业的 X—非效率现象大量存在背景下，民营企业家资源的拓展十分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如鲍莫尔（1982）在可竞争市场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正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可把市场均衡推向社会福利最优化。即在潜在进入压力存在情况下，会迫使现存企业无论处在何种市场结构形态，都仍能遵循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定价原则和保持高效率的生产

组织。

## （三）企业家资源拓展与比较优势增进的互动

新古典范式有关知识和信息内涵的研究未将隐性的知识（如 Know How）与显性的知识（如 Know What）加以区分。企业家才能的基础是知识。在理解市场过程时应强调企业家的学习和发现。竞争性市场的动态过程是分散知识与信息的发现、利用、创造、传播的过程，其主体是企业家。因而，亟需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家的创造性才能在动态比较优势形成中的重要独特作用。从市场信息的处理效率视角来看，企业家才能的提升与市场规模的扩大有着以下关联：（1）对市场知识和信息的有效发掘与运用，即通常意义上能对商机及时捕捉，是企业家才能得以体现的主要方式；（2）企业家在对商机捕捉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市场信息，从而使得其他企业家面临了新的信息环境，在这一基础上，新的商机会更多地涌现；（3）由于以上两点原因，使得市场的知识和信息又进一步传播到更广泛的领域。由此可见，对于市场知识和信息而言，企业家不仅是发掘和运用的主体，更是创造和传播的源泉。这三个层次的综合结果是市场交易机会的增加与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显而易见，市场规模的扩大与企业家资源拓展之间可形成良性互动。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于经济主体按比较优势来进行分工，因此，动态比较优势增进也会体现在分工深化上，但这又受市场规模的约束。依据他的理论，对分工深化的程度存在着测度困难，但杨格（A. Young, 1928）却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测度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即报酬递增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分工的演进状况和市场规模的互动水平。由于社会分工的程度可以由市场规模来估计，由此可得到以下推论：即以分工深化为标志的比较优势动态演进与企业家资源拓展之间的重要关联纽带，是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这既可表征社会分工的深化，又可为企业家潜能

①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37页，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的发挥拓宽信息渠道,使其能更有效地利用市场信息、捕捉获利商机,其结果是企业家资源的内生性拓展。这表明,企业家资源的拓展在一国比较优势动态演进中扮演的角色极为关键。应该指出,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而不仅仅局限于以贸易投资等指标体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状况。林毅夫(2003)强调将“经济开放”(openness)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解释变量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显然,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开放程度和贸易规模的内生决定因素,而不是外生决定因素。

从知识和信息的视角可把握市场经济与企业家资源的内涵本质。企业家作为市场知识与信息的高效率处理器,其市场角色与功能实际上是发现、利用分散的市场知识和信息从而捕捉商机并予以试错,同时创造与传播新的知识和信息,其才能充分发挥的关键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此即为企业家资源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互动的机理所在,两者之间的关键纽带应为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

### 三、企业家资源拓展与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互动途径

从产品市场向资本市场、从网下市场向网上市场、从国内市场向境外市场的延伸与拓展,是市场规模扩大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与企业家潜能拓展互动的实现途径。在诸多可能的“途径”(approches)中,本文选择以下三个方面对企业家资源拓展与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互动实现途径作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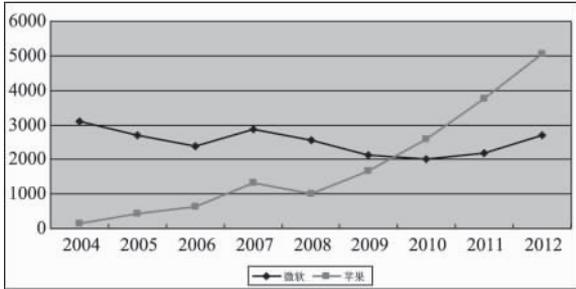
#### (一)“互动途径 I”: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自 20 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国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首次实现了分离,有效推动了家族资本主义向管理资本主义的转换,有力促进了作为一揽子要素支配者的企业家之才能的发挥,并由此催生了一大批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当时作为新崛起大国的美国,也因此成为了“托拉斯帝国”。今天,作为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家成长的途径通常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家→现代企业家”,而作为具有较高交易效率且有制度保障的资本市场之

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显然能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具体而言,资本市场对企业家资源的拓展有以下促进作用:(1)获取比单纯依靠银行信贷更高的资金融通效率。(2)企业通过上市规范运作、信息披露、接受相关部门监管等,有利于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产权制度和科学、合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家的经营和管理水平。(3)资本市场是企业一揽子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平台,企业的资产重组、并购都需依靠它。与单纯依靠银行融资方式相比,资本市场对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效果更加显著。(4)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要成长壮大,就必须高度重视产品、服务与市场需求的紧密结合。但企业生产经营的努力难以仅通过财务核算来确定,通过市场交易则能更充分及时地反映出来。在资本市场中,千千万万投资者按市场经济原则来比较、筛选,并对相关企业的产品、项目及企业的整体价值形成综合判断后所致的投资决策及其在公司市值上的反映,可产生源源不断的信息流,这是其他任何评估系统所难以提供也难以替代的,并因此可使企业家资源获得内生性的拓展。(5)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经营努力后所获取的绩效与回报及其保障(如剩余索取权),是企业家精神培育和企业家才能发挥的主要动力源泉,也是企业家持续不懈经营努力的重要驱动力,而这离不开资本市场。因此,相对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企业家所产生的激励是内在的、持久的。同时,这一市场也是实现企业家优胜劣汰的重要途径。

应该指出,资本市场的经济功能绝不仅仅是为企业提供融资,更重要的是其通过一揽子要素较高效率的交易而产生的信息流,在动态评估企业家才能发挥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以美国著名的“硅谷双雄”微软公司、苹果公司为例(如图 1 所示),乔布斯的第二次入职与盖茨的退休在“苹果”和“微软”的市值比较中可见清晰地体现。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不仅可使企业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分工深化,而且可使企业家这类特殊要素与其他诸要素,如金融、技术、管理等要素之间的分工深化,交易效率可得到明显的提升。经济史上以资本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的制度性分工为背景的“经理革命”,就是依靠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完善而实现的。

图1 2004—2012年微软公司、苹果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市值比较(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 BvD 系列库\_OSIRIS—全球上市公司分析数据库。

(二)“互动途径 II”: 通过产业链治理提升集群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的初期, 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在企业内分工(通常适用于大企业)相对不足的前提下, 许多企业采用企业间分工来替代企业内分工, 从而促使产业集群的涌现。大批中小企业借助“集聚经济”可有效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此类以马歇尔外部经济为特征的块状经济在形成过程中通常依托地缘、业缘、人缘,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企业内分工水平较低的负面影响。因而, 研究转型经济中中国企业家资源的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增进, 有必要关注产业集群<sup>①</sup>的竞争力提升。

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来看, 依据“链”的上、中、下游状况采用“两端攀升、首尾衔接”的治理模式, 可有效提升集群的竞争力。具体可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1. 通过产业链的下游治理使集群市场销售份额扩大, 促进集群分工的深化, 从而增进动态比较优势。

第一, 采用适度利润率的价格竞争策略。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偏好纷纷采取差异化竞争的策略, 而这又会受到追求规模经济目标的制约, 若要缓解这一“两难冲突”, 必须借助于企业市场销售份额的有效扩大。其作用体现在: (1) 使产业链中游制造的规模经济与下游销售的规模经济形成良性互动, 销售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使得生产商获取规模经济; (2) 销售份额的大幅提升可以实现范围经济, 进而在集群范围内形成某种“链”内“上下游”环节间的外部经济, 这可使要素获得边际报酬递增。由此可

增进集群的整体外部经济, 并通过适度的利润率下降换取利润基的扩大而获取总利润的上升(类似于“拉弗曲线”的原理)。这表明, 通过集群市场销售份额的扩大可促使集群分工的深化, 从而增进动态比较优势。

第二, 采用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结合的策略。这可使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比翼齐飞, 并促进网下、网上市场彼此协同。现代网络交易与搜索引擎可以有效缓解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两难冲突”, 从技术维度大幅度提升交易效率, 扩大市场规模, 使企业家的活动平台得到快速扩大, 并使集群从传统地域空间上的集聚向全球范围内价值形态上的集聚升级, 通过消除企业家的进入壁垒来促使商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三流融合”, 可使集群的销售份额得到大幅提升。

2. 通过产业链的上游治理来构建以激励相容为特征的集群研发与共享技术平台, 使集群的议价能力增强、竞争力提升, 从而增进动态比较优势。

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中国, 企业家创业初期受所能支配要素有限的制约, 企业规模大多偏小, 其独立研发的成本往往不符合效率原则, 故大多采用模仿创新利用技术外溢。这在集群形成的初期有其合理性, 也正是形成集群马歇尔式外部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一外部经济也会诱发外部不经济。现有的研究通常对集群因外溢而导致的“外部不经济”缺乏关注, 又由于集群内企业的研发通常涉及较高的沉没成本, 故在集群形成的早期此类外溢虽然有助于集群的外部经济得到提升, 但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由于此类外溢所导致的经济利益日趋明显, 集群内的大多数企业就会在利益驱使下以“搭便车”的形式来利用此类外溢。在这一背景下, 集群的创新就会因陷入“囚徒困境”而停滞不前, 其结果是集群竞争力的不升反降。在这一阶段, 集群的外部经济通常会由前期阶段的上升转为下降。若以产业链上游治理破解集群创新的“囚徒困境”, 则通过“集群共享技术

① 中国的产业集群大致可分为: 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导的嵌入式集聚(如许多在江苏省的集群)和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内源性集群(如许多在浙江省的集群)两大类。从比较优势动态演进视角, 本文着重研究后者。

的研发平台”的构建,可实现群内各相关主体的合作博弈与“激励相容”,由于集群共享的研发成果在使用上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故可使集群的外部经济由降转升,从而提升集群的竞争力。

应该指出,上述产业链“上游”与“下游”治理是可以相互协同、良性互动的。例如,产业链上游研发环节的治理可提高下游销售环节的利润,而下游销售的规模扩大又能提升上游研发创新的效率。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协同可导致更多的外部经济在集群中形成,从而扭转前述外部经济由升转降的不利趋势,使其由降转升。由此使得前述“囚徒困境”得到化解。从总体上看,基于上述产业链治理可扩大集群的有效市场规模,使其分工深化、交易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获得内生性强化。

(三)“互动途径Ⅲ”: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市场是企业家提升素质的另一个有效平台。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初见成效,已从简单的产品“走出去”发展成为一揽子生产要素“走出去”。这样不仅使得中国企业通过国际、国内两市场在经营上的协同互补提升竞争力,更可以让企业家开拓市场战略眼光,从而提升一揽子要素优化配置的水平。

国际市场交易就其复杂程度而言,往往高于国内市场,如何驾驭国际市场的交易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企业家才能。中国企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市场规模扩大,可使自身获取更多的规模经济,而这类规模经济从本质上来讲是企业家才能的函数,故通过制度创新来激活、提升企业家的才能,可有效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增进。

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其阐述的种种“优势”主要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作为跨国公司进行FDI的动因解释;其二,作为跨国公司FDI后的在东道国所形成的某种优势。另一自成体系的“小岛清理论”则重视了跨国公司母国国家层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中国OFDI的研究,必须针对尚不具备欧美跨国企业垄断优势的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否通过“走出去”有效利用

世界市场来增进动态比较优势这一尖锐问题予以回答。事实上,通过企业家对各种要素的创新性“组合”,即使企业的规模在早期还不够大,但只要采取明智的投资策略,就能更有效地利用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这种基于OFDI而获得的新的比较优势可具有以下两类属性:

1. 双重互补性。对于投资东道国来说,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其在国内市场的经营不仅通常拥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而且相对于那些没有海外投资却与其竞争的国内对手而言,又拥有境外市场在原料采购、技术获取、融资便利以及海外渠道控制等方面的优势。而这两种优势又是可以互补协同的。现有的主流国际投资理论通常较多关注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所具有的优势,如邓宁的“三优势”理论,而这些优势也通常是由跨国公司投资行为而形成的。由此,过往的研究往往忽视这样的“投资”在进行过程中同时也往往会伴生的一个领域,即国内同行业之间的竞争,这对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尤其如此。因此,企业在进行OFDI的同时,若能前瞻性地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并在要素新组合中重视两者的互补协同,则可获取“一石两鸟”的效果,使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增进更显著。例如,浙江吉利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2010年8月运用并购这一OFDI的重要形式获取了沃尔沃公司100%的股权及相关知识产权,这使得其不仅跨国控制了沃尔沃轿车公司多年来研发的积累,并使之与中国巨大的市场购买潜力与丰裕的人力资源有效结合,显著提高了经营绩效。“在并购后的2011年前三季度,沃尔沃汽车在全球市场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长27.7%。其中,中国市场增速继续领跑,在过去6个月中保持60%的增长速度,9月份甚至达到113%的增长。该公司在欧洲国家的销量也呈直线上升之势,在德国销量增速达到49%以上。”<sup>①</sup>对于吉利在中国的本土企业而言,收购沃尔沃后即可利用沃尔沃的全球销售网络及其知名品牌,而对吉利经营控制下的沃尔沃而言,也可充分利用吉利的本土企业在中国境内的销售网及其品牌。并通过供应链的重组与优化可大幅降低运营成本,获得

① 郭丽君:《吉利汽车:“弯道超车”的启示》,载《光明日报》,2011-12-31。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截至 2011 年,吉利共申请了 3464 项专利,特别是在整车造型设计、安全碰撞技术、核心零部件技术等开发能力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并拥有了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变速箱。

2. 激励相容性。中国企业家通过 OFDI 对市场信息无论是在发现还是处理方面,都会更有效率,要素通过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重组而得到优化配置的概率会更高,可利用的商机也会更多。显然,中国企业家通过 OFDI 参与国际分工可使斯密定理中所揭示的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从而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内在增进形成良性互动。应该强调,这一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是 OFDI 的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激励相容<sup>①</sup>。在国家层次上,一方面,中国作为投资的母国不仅在新市场的开拓、原材料的采购,还可在关税壁垒突破、先进技术获取等诸多方面获益;另一方面,被投资国(东道国)在国民收入提高、就业岗位增加等方面也可得到实际利益,这种投资与被投资双方之间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共赢与优势互补所导致的利益共生具有可持续性。

####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理论上的比较优势(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要转化为现实中的比较利益,都必须通过真实世界的传导。在转型经济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资源禀赋结构升级会面临难以化解的信息障碍。作为市场知识和信息高效利用者的企业家,则是化解这一障碍的核心主体,并由此构成推动一国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关键动力源。

第二,企业家作为一揽子要素配置的支配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资源配置优化”的核心地位,是中国社会经济开放与发展中关键的主动性资源。中国若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中避免“低端锁定”,必须依靠企业家资源的拓展与才能的发挥。这就要求相关研究尝试突破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主体行为研究方面囿于“经济人”假定的窠臼,而将企业家才能的提升与资源的拓展作为新的关键要素纳入到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研究框架中。显然,在经济全球化中,企业家资源的拓展是中国获取更多比较利益的捷径。

第三,资源禀赋结构升级的重要前提之一是

“干中学”主体结构的升级,政府通过体制改革化解行业进入壁垒,既可通过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配置优化中学”,有力促进其才能的发挥,又可减少国有企业中的 X-非效率、降低市场垄断程度、推动市场规模有效扩大,由此可构成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重要源泉之一。

第四,中国企业家才能的充分发挥关键途径是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具体有:(1)发展与完善资本市场;(2)通过产业链治理提升集群竞争力;(3)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强调,比较利益的获取不仅体现在商品与服务的成本差异或价格差,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可使企业家配置要素的时空得以拓展,且能有效提升企业家的才能。因此,对企业家资源的拓展提供激励,从而使中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得以持续增进。

主要参考文献:

1. Avinash K. Dixit, Joseph E.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 No. 3, (Jun., 1977), pp. 297—308.
2. Baumol, William J, Panzar, John C, Willig, Robert D.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New York), 1982.
3. Grossman G. and Helpman E.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 pp. 43—61.
4. Kor, Y. Y. and Mahoney, J. T. "How Dynam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Resource Deployments Influence Firm-level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 pp. 489—496.
5. Krugman P. "The Narrow Moving Band, the Dutch Disease, 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 Thatcher: 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

① “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指的是一方预期利益的实现建立在另一方或其他诸方预期利益实现的基础之上,即相关各方的预期利益具有“共生性”(symbiosis)。当相关各方形成共生利益时,它们之间可具备激励相容的动力基础。因此,利益共生化实际上是激励相容的根本动因。不仅如此,激励相容的相关各方可互相“锁定”(interlocked in)于共生利益之中,由于具备目标函数的激励相容,相关各方的共生利益可动态增强,产生某种“正反馈效应”(positive feedback effect)。详见张小蒂等(2008,2011)。

*nomics*, 1987, 27, pp. 41—55

6. Lucas R.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3—42.

7. Yang X. And Ng Yew—Kwang,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orth—Holland, 1993.

8. [美]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何帆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 [美]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重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2.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3. 张小蒂、李晓钟:《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载《学术月刊》,2001(6)。

14. 张小蒂、李晓钟:《转型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殊性及其成长特征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08(5)。

15. 张小蒂、罗堃:《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节能减排的可持续性——兼论新型清洁发展机制》,载《学术月刊》,2008(11)。

16. 张小蒂、贾钰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5)。

17. 张小蒂、贾钰哲:《全球化中基于企业家创新的市场势力构建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1(12)。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家资源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互动机理及途径研究”(71173181)、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基于产业链治理的浙江若干典型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研究”(11JDQY01Z)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敏)

## The Mechanism and Approaches of China'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hancement

—Based on Perspectives of Entrepreneurs' Resources Enrichment

Zhang Xiaodi & Jia Yuzhe

**Abstract:** With the pace of globalization, China must exert the bet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order to meet an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Entrepreneur resource is the most active and critical initiative resourc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factor optimal allocation. To enrich the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and to bring the entrepreneurs' potential into full play are key to the enhancement of a country'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especially to countries in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such as China.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effective market size is essential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enrichment and th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hancement. And further analysis clarifies the connection principle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of the "interaction". Our study extend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enhances its explanatory power in the real world, thus providing useful ideas for reversing China's disadvant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creasing its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entrepreneur resource,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market extent, interactive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